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青年

主持人 阎治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青年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党成立的历史和党的青年工作的历史,本刊组约了两篇文章,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青年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培养时代新人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前一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运动中的传播、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新局面;后一篇文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培养时代新人的历史经验,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历史经验,并论述了这些历史经验的现实启示。期待通过这两篇文章,加深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青年运动关系的理解,加深对党的青年工作的理解,加深对青年成长目标的理解。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1.04.00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青年运动

■ 阎治才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在这一过程中,先进青年及其开展的青年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与中国青年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在青年运动中的传播,为中国共

收稿日期:2021-07-02

作者简介:阎治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中共党史、思想政治教育。

项目基金:本文系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重点课题“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进行科学历史观教育问题研究”(课题编号:ZD200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产党的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批先进青年成长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重要的干部准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开辟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新局面。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工人运动 青年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辟,都是同中国青年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分析和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青年运动的联系,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作用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工作、青年运动的领导,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一、中国青年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然也包括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传播。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传播就是这种思想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一)中国青年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传播条件的具备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青年运动中传播,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青年运动中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条件。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进步青年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可能。

在当时的中国青年运动中,已经出现了一批进步社团。中国最早的进步社团,是毛泽东于1917年秋开始组织、1918年4月正式成立的新民学会。1918年5月中国学生反日斗争后,一些爱国学生组织了同言社、工学会、共学会等社团,随后又成立了国民社和新潮社。同年6月,进步记者王光祈在北京开始筹备建立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是筹备人之一,后来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学会。1919年3月,邓中夏等在北京组建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周恩来于1918年5月参加了爱国社团新中学会。1919年五四运动后,进步社团大量建立,原有的社团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这些社团各自的宗旨看,它们不是单纯为着研究学问而建立的学术团体,而是为了改造中国社会而建立的政治组织。虽然这些社团及其成员在改造中国社会问题上主张不一,但只要坚持改造中国社会,坚持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出路,总会有一部分青年或早或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近代中国的出路所在。

在当时的中国青年运动中,向西方学习的观念已经淡化。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一些人物就开始向西方学习,以为学习西方国家就能够“制夷”,能够“自强”“求富”,能够建立“民国”。1915年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仍然是向西方学习。但是,所有向西方学习的活动,最终都失败了。“民国”有名无实,“民主”和“科学”也只是一些人的进步言论,只是一种新的思潮而已。这样,人们对学习西方便不能不产生怀疑。“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五四运动前后所建立的社团主张改造中国社会,但基本上都没有把建立西方式的国家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从这些社团及其成员的主张来看,基本上都存在对社会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向往。当然,他们当时所向往的社会主义,还属于各种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但各种形式的空想

社会主义毕竟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表明,在中国的进步青年中,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观念已经淡化,已经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尽管他们在当时所追求的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只要坚持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在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主张和实验没有出路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

在当时的中国青年运动中,对工农群众的力量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且有了接近工农群众的活动。辛亥革命失败后,工农群众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仍在继续发展。从工人斗争看,从1914年到1918年,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斗争每年都多次发生,特别是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联合罢工和1918年上海等地工人的反日罢工,都有着较大的影响。从农民斗争看,河南宝丰县农民白朗领导的起义军从1911年到1914年坚持斗争三年,人数最多时达2万余人,转战5个省份,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1914年到1918年,少则数百人、多者上万人的农民斗争没有间断过。工农群众反抗斗争的发展,使一些进步青年开始认识到工农群众的力量。与此同时,一些青年开始接近工农群众。毛泽东在1917年暑假,用一个月的时间考察了湖南5个县的农村。同年11月,他又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教育研究部的名义,创办了长沙工人夜校。从1918年冬到1919年春,即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期间,曾与邓中夏讨论工人问题,并两次到长辛店了解工人情况。五四运动前邓中夏等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工人和市民中结合他们的生活实际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讲演活动,五四运动后又到了乡村去进行讲演。当时许多未能接近工农群众的青年,也都在关注着工农的生活和工农斗争的发展。对工农群众力量的认识、对工农的接近和关注,是进步青年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条件,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指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实现自身解放的理论。

正因为中国青年运动中有以改造中国社会为宗旨的进步团体,有了对社会主义的朦胧追求,有了对工农群众力量的初步认识和对工农群众的接近和关注,所以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在中国青年运动中得到传播。

(二)中国青年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开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长期以来积极探索国家出路、对学习西方持怀疑态度的先进知识分子从这场革命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希望。他们经过研究和比较,逐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是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传播,是同李大钊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联系在一起的。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中国报刊上的报道可谓五花八门,不能正确说明这次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李大钊此前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从这些报道中看出这场革命的真相。1918年春,李大钊就曾向友人说明过对这场革命的看法^[3]。同年7月,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于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4]。同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在前一篇文章中,李大钊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劳工主义的战胜,是“庶民的胜利”,并指出今后的世界将是“劳工的世界”^[5]。在后一篇文章中,李大钊指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的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这个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并发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6]的预言。这三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指出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也是在中国青年运动中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从1919年5月开始,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对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在李大钊的主持、帮助和影响下,《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晨报》副刊和《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上相继发表了一大批研究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主要作者除李大钊外,还有杨匏安、李达、李汉俊、陈独秀等。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宣传者。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节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摘译)、《雇佣劳动与资本》(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以及马克思、列宁的传略也相继发表和出版。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系、历史系、法律系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向学生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传播,不但同李大钊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联系在一起。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运动中传播的两个方面。

随着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进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也开展起来,青年运动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后,就受到李大钊等的影响,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哲学和新闻学研究会,研究各种新思想、新学说。1919年12月第二次到北京后,毛泽东读了许多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文章,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对毛泽东的影响“特别深刻”^[7]。周恩来1917年10月至1919年4月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并成为河上肇所办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社会问题研究》的热心读者。1920年他在法国期间,把“研究主义”即研究马克思主义放在第一位,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真地划重线、写眉批、记笔记^[8]。

外文水平对于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意义重大。周恩来正是由于具有日文与英文阅读能力,才能阅读日本学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及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蔡和森在法国为了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用一段时间“恶补”法文,才能在几个月的时间“猛看猛译”^[9]了几十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是陈望道由日文版翻译过来的。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蔡和森正是在翻译的基础上研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书籍,才能够提出让毛泽东“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0]的见解。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由于心神专注,竟把墨汁当作糖蘸粽子吃,还说很甜。这就是“信仰的力量”^[11]。

随着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们所组织的社团也开始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活动内容,如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组织的新民学会、恽代英等组织的互助社等。在少年中国学会和国民社中,也有一部分成员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组织起来的社团,如周恩来和邓颖超等组织的觉悟社、赵世炎等组织的少年学会、袁玉冰等组织的改造社等,这些新社团几乎在一开始就把研究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活动内容。除这些社团外,还新建立了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如在李大钊帮助下在1920年3月建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今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于1920年8月在长沙建立的俄罗斯研究会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中的传播,中国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使中国先进青年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对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对工人阶级政党领导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些

初步认识,是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重要认识前提,成为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准备。

二、中国青年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产生了一批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干部上的准备。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先进青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先进青年成长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重要的干部准备。

(一)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开始结合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是通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开展工作来实现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当然包括青年运动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所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就包含着或包括了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在五四运动中,正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的政治罢工,使学生运动得到了工人运动的支持,军阀政府才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才不得不罢免卖国官僚,这就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包括先进青年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世界上吃饭问题最大,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并说俄罗斯“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让“全世界为之震动”^[12]。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许多文章都体现了对劳动群众力量的认识。比如:“改造的责任,在于工农”,改造的方法“在于‘自觉’和‘联合’”;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懂得“劳工的地位和价值”并“和他们打成一片,灌输他们的知识,使他们有组织有办法”^[13]。

基于对工人阶级、对劳动群众力量的认识,先进青年更加关注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到工业企业、劳动场所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并把调查的结果发表在一些报刊上。1920年《新青年》纪念劳动节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等纪念文章,还发表了一批关于全国各地工人生活状况和斗争情况的材料,其中包括上海、天津、唐山、无锡、香港等工业城市和一些省区的相关斗争材料。这些材料不是一般的即时报道,而是一种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综合性的报告材料,有的还附有相关的统计数字。其他一些进步报刊有的也出版了劳动节专号,或有相关的纪念文章和相关材料。这些报刊的编者、记者和作者都是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所以,这些文章和相关材料都体现了五四运动以来他们对工人和工人运动的关注和接近,体现了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倾向。

1920年“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同样体现了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在北京,李大钊、邓中夏带领一批进步青年组织召开了纪念会,到会的工友和学生共500余人,并在市内进行了宣传活动。北京郊区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举行纪念大会,邓中夏专程到会讲话。1920年4月中旬,陈独秀等在上海联合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等7个团体发起召开了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筹备会,陈独秀在筹备会上作了关于劳工问题的讲演(即《劳动者的觉悟》)。这次活动遭到了上海反动当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破坏,但庆祝大会仍然在各方的努力下得以召开,并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和有关通告。在广州,“五一节”当天召开了有学生和工界团体代表参加的纪念会。在长沙、九江、汕头、唐山、漳州和哈尔滨等地,也进行了纪念集会和宣传活动。这次纪念“五一节”的活动,“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最初尝试”^[14]。

(二)先进青年在工人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青年运动与工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在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先进青年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

先进青年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向工人进行演讲和办工人夜校。邓中夏等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五四运动以后有了很大发展。不但人数有了增加,而且讲演的地区由北京城区扩大到郊区,并且到保定地区开展讲演活动,讲演的对象也由工人、市民发展到农民。在国内其他地区,也有“义务教育团”或“通俗讲演团”开展活动。当时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主要做法是开办平民夜校。因为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门提倡平民教育,开办平民夜校不但合法,而且便于工人业余学习,便于青年学生课余从教。所以,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比较普遍地建立了平民夜校、国民半日学校、工人补习学校等。这些演讲团体和平民夜校的主要对象是工人,先进青年们在教文化课的同时必然要讲到革命的道理,用通俗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先进青年在工人中进行的组织工作主要是组织工人运动。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在他为主要领导人的湖南学生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中,就积极组织工人群众参加斗争。1920年6月驱逐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又积极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10月8日,毛泽东出席在长沙举行的有工人代表参加的400余人的湖南自治促进大会,被公推为大会主席。10日,他组织了有大批工人参加的约两万人的市民游行,“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15]。邓中夏早在五四运动前就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在工人和市民中进行爱国宣传,并且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之一。1920年五一节,邓中夏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在北京大学组织了有校工和学生500余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并于当天赶到长辛店向1000余名铁路工人发表演讲。在这前后,邓中夏等多次到工人中进行组织工人的工作,于1921年元旦正式召开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即工会)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五四运动中不但领导了天津的学生运动,还积极组织工人和市民。1919年10月10日,天津学生、工人和市民四万余人举行共和八周年纪念会,会后的游行遭到警察的阻拦和殴打,周恩来等4人被推为代表进警察厅质问。1921年春夏他在英国、法国考察了当地的工人运动,并先后写了9篇研究工人运动的文章,认为“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16]。总之,先进青年成长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都有组织工人运动、参加或考察工人运动的经历。

(三)先进青年成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必然是在提高工人阶级组织程度的同时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产生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队伍是从1918年到1920年上半年逐步形成的。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队伍在当时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二是工人群众中的先进分子。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从家庭出身来看,一般都来自富裕家庭或比较富裕家庭。也就是说,他们的家庭出身并不是工人家庭,他们本人也并不是工人。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他还指出:一定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本身可能没有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但他们在各种社会关系和主观能动的相互作用下可能成为其家庭出身之外的阶级的代表性人物。马克思本人不是出身于工人家庭,但却成了世界工人阶级的导师、领袖和理论家。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本来就同情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工人的斗争,他们在接触、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然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现实生活中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理论,只有结合工人运动的实际才能理解这个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统一的理解,以及在工人中宣传和组织工作,使他们逐步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历史使命,逐步地站到了工人

阶级的立场上来,从而逐步成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矢志为工人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先进分子,即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毛泽东曾经说过,在组织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18]。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都是在了解工人运动、组织工人运动、指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才逐步成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例外。

中国工人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是由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而产生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不能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说过,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五四运动中“是起了大作用的”^[20]。这种大作用,就包括倡导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可以认为,到1920年上半年,工人群众中也产生了一批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成员之一的李中,就是造船工人。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早期组织之所以能够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就说明工人群众中逐步产生了一批先进分子。当时,党还未在工人中建立组织,工人中的先进分子一般地说也难以参加党的早期组织。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能够在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就说明在党成立前工人群众中已经有了一批先进分子。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与中国青年运动

不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青年运动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与青年运动联系在一起,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也是同青年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同时也是领导青年运动的过程,是青年运动新局面的开辟过程。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由于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逐步形成了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队伍,这就使建立中国共产党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日益具备。

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去上海同李大钊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决定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开展建党工作。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是为在北京建立党组织做准备。陈独秀在上海,通过刚从北京迁到这里的《新青年》编辑部开展建党的准备工作。同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达北京,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他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又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这样,建党的准备工作便进一步组织开展起来。

1920年8月,由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7人发起,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了党章草案。随后,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未发表),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次会议还决定,由上海党组织同各地进行联络,建立各地的党组织。经过上海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和各地相关的组织工作,到1921年春,李大钊等在北京、董必武等在湖北、毛泽东等在湖南、王尽美等在山东、陈独秀(1921年1月到广州)等在广东、张申府和周恩来等在法国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此外,上海党组织的两名成员到日本留学后,在日本成立了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起着领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第二种类型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起着骨干作用和榜样作用,是党的早期组织成员的多数。第

三种类型以董必武和林伯渠为代表,他们是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从年龄上看,第二种类型的成员是多数,也就是青年是多数,在青年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成员是多数。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青年运动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早期组织相继建立后,更自觉地、更有组织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学说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并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在这同时,各地党组织把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1920年8月上海党组织成立后,于同月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党组织成员俞秀松任书记。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高君宇任书记。同月,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张太雷任书记。同月,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陈潭秋任书记。同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谭平山为负责人。1921年1月,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其他地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尚未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尚未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以这些组织还不是正式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组织。

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建立后,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同各地党组织一起开展青年工作,发展青年运动。上海青年团开办了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为负责人,俞秀松为秘书。在学社开办的10个月间,培养了一批干部,实际上成为党培养干部的第一所学校。各地青年团积极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刊物《共产党》和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刊物,如《劳动界》《劳动者》等刊物上的文章,有些青年团员还参加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各地青年团与党组织一起开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会,发展工人运动。如北京党组织和青年团开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对于培养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干部、发展北方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各地青年团还在各类学校发动学生开展反对学校当局的不合理制度、维护学生应有权益的斗争。

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不但使中国青年运动开始有了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而且使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时起就有了自己的助手和后备军。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上,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当时,党在各地的早期组织对领导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经验,没有把上海青年团的领导机关作为各地青年团的总的领导机关,各地青年团的入团标准、入团程序也不尽一致,对团员的组织生活乃至纪律要求也缺少严格的规定。这样,就使各地的青年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政治思想不一致、组织行为不统一等问题,再加上1921年初以后,上海青年团的主要领导者和大批骨干去了俄国,其他一些地区的团组织也有相关的人事变动。所以,在1921年5月前后,大部分地区的团组织相继出现了活动暂时停顿的现象。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但也表明党组织在青年团工作方面的不足,需要加强党组织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青年运动的重大意义

由于党在各地的早期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的开展,特别是早期党组织在工人中的工作开展,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具备。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制定了党的纲领,即“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21]。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确定党的主要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发展工人运动^[22]。这次大会还专门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决定了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加入共产党的办法,对于巩固和发展青年团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3]。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央局(即中共中央)决定由张太雷、施存统等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整顿和恢复工作。1921年11月,中央局发出《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决议》,其中要求“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并要求各地区按照中央的青年团改造宣言及章程“从速进行”青年团的恢复和发展工作^[24]。在各地党组织、团组织的努力下,到1922年5月,全国8个省的17个城市都建立青年团的组织,团员的数量达到5000人,青年团的各方面工作也得到了初步的加强。1922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历时6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大会上作了讲演。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以及相关的青年工作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团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1922年6月,旅欧青年团组织(即“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巴黎正式成立,赵世炎任书记。旅欧青年团组织成立后,得知国内已经正式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是决定加入,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1923年2月,旅欧青年团组织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受国内青年团中央的领导。会议重新选举了团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推举周恩来为书记。所有这些,不但使中国青年运动有了一个统一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也使青年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以迅速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青年运动相互关系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批先进青年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重要的干部准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青年运动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开辟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新局面。一百年来,中国青年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都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结果。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 [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 [3] 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 [4][5][6] 《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2-104、110-111、114-117页。
- [7][18] 《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5页。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7页。
- [9] 《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 [10][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8、49页。
- [11]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讲故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1-73页。
- [13] 丁守和 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49页。
- [14] 李新 陈铁健:《伟大的开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页。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898-1976)》(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 [1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700页。
- [20]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 [21][2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7页。
- [23] 李玉琦:《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稿》,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 [24] 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责任编辑:韩永涛)